鏖兵西北

上　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挺进西北

一、西北王与青、宁二马

1949 年 4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 22 年反动统治的终结。旌旗所指，势不可挡。二野、三野、四野各路大军继续向华东、华南进军，国民党军如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等地逃窜。

此时的蒋介石，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据西南，连接西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苟延残喘。为此，他将维持残局的希望首先寄托在西北地区 40 万国民党军队身上，令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和西北“土皇帝”马步芳、马鸿逵配合作战，力保西北不失。

祖国的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面积约 320 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 3200 余万，是汉、回、维吾尔、藏、哈萨克等 17 个民族杂居，而以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地区。该地区南连湖北、四川、西藏，东临内蒙古、山西、河南，外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原苏联等国接壤，国境线全长 6180 公里。西北地区横跨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著名的天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祁连山、贺兰山、秦岭、大巴山纵横其间，塔里木、柴达木、腾格里沙漠浩瀚，戈壁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

富，当时的石油蕴藏量和产量均居全国之首，煤、铁、盐及其他贵金属蕴藏量也很丰富。然而，当时的大西北，由于地广人稀，山脉纵横，沙漠荒原横亘其间，虽有高原、平川、盆地分布各省，却因大部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加上长期处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盘剥压榨之下，以致经济凋敝，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由于地处边陲，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文化落后，封建习俗、宗族统治、宗教势力、民族矛盾等社会条件错综复杂，加之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渗透其间，进行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大西北地区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解放和经营大西北，带来很大的不利和困难。

盘踞西北 40余年的马家军，通称“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包括马步青），简称“青马”；宁夏的马鸿逵，还有马鸿宾，简称“宁马”。这是一伙靠野蛮残暴统治压榨民脂民膏，向上邀功请赏而发迹起家、双手沾满西北人民鲜血的地方军阀，并曾经是红军和八路军的凶恶敌人。

说起马家军的发迹，要从“二马”的祖辈马占鳌的起家谈起。

马占鳌世居河州摩尼沟何家庄，其先世念经传教，家道贫寒。马占鳌先在本地念经传教，后到西安大学巷清真寺学习，长了不少见识。“穿衣”（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在本庄寺内做开学阿訇。他常把在西安所见所闻的一些事对教民们讲，渐渐使本地教民有了反抗暴政的意识。

马占鳌虽然家境贫寒，但他有个有钱的叔叔。他对叔叔在乡间放高利贷非常不满，常劝叔叔放弃债权。但他叔叔利欲熏心，哪里肯听侄儿的话。马占鳌便教借债的穷人抗债不还，还大造声势，到处宣扬要替呼拉（安拉）行事，杀掉他叔叔。他叔叔知道

自己不得人心，又害怕其侄儿真的要杀他，只得依了马占鳌。马占鳌由此赢得了广大乡民的信任。

河州位于甘肃西南一隅，北面是黄河天险，东南由兆河围绕，西南层峦叠嶂，有明代修筑的关隘暗门 24 道，直通甘南藏区和青海循化。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这一险要地带，自汉以来，凡中原君王必在河州设州建郡，把河州作为西陲重镇，派重兵把守。

当时，清政府腐朽透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占鳌率领四乡回民举起反清义旗，攻下了河州城。但后来他又率部投归清军，反过来镇压回民起义，马家军由此而兴。最早起事河州的三个马姓头领马占鳌、马海晏和马千龄自然成了马家军第一代领军人物。

第二代马家军是指马占鳌的儿子马安良、马海晏之子马麒、马麟，以及马千龄之子马福禄、马福祥。他们子承父职，结党占城，是恶贯满盈的军阀头目。民国初年，马麒任西安镇总兵，号称宁海军，在青海独霸一方。马麒死后，先由其弟马麟接任，后又由马步芳取而代之。马福祥占宁夏为王，后由其子马鸿逵做了宁夏王。马步芳、马鸿逵算是马家军的第三代人物，他们最为凶残，为害最烈。

在马家军第三代人物中，马步芳是最能干的一个。他生于 1903 年，9 岁随父到西宁，曾在东关清真大寺当“满拉”（学习经文的小学生），后看到兄长马步青任宁海军马队管带（营长），出入前呼后拥，声势显赫，与自己在清真寺的清苦生活成了鲜明对照，遂不安心学经，一再请求马麒为其安排军职。马麒即在他的宁海巡防军第一营为他安置了一个帮办的小头目的位子，让他协助其兄马步青做事。

马步芳进了军营，可谓如鱼得水。在长期的征战与搏杀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学会了带兵打仗，也学会了如何镇压反抗的民众。中原大战前后，他和父亲一面暗中活动，加强自身力量，一面积极搜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各方的情报，伺机应变。交战初期，谁胜谁负难以预料，西北又在国民军控制之下，马麒父子仍表示拥冯倒蒋，派马步芳率骑兵一旅随冯军进军陕西。然而，背地里却派人同蒋介石联系。1930 年 9 月，冯、阎反蒋失败，马麒父子立即拥蒋反冯。蒋介石考虑到西北鞭长莫及，一时无力顾及，决定利用“青马”，承认了他们在青海的统治地位。在蒋介石政权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或被消灭，或遭削弱，马步芳却例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族武装势力。

马麒死后不久，马步芳又把亲叔叔马麟赶下台，自己当起了青海省至高无上的土皇帝，人称“青海王”。他手段毒辣，凶残无度，多次血腥镇压藏民部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马鸿逵生于 1892 年，1909 年赴兰州考入陆军小学堂，对军训体操和军事科目十分感兴趣。 1912 年到其父部下任营长，继升任宁夏新军统领。1925 年 3 月，冯玉祥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马福祥父子迫于冯军势力，只得对冯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交冯军大将李鸣钟，自己担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冯玉祥为安慰马氏父子，委马鸿逵为陆军第七师师长。 1927 年，马鸿逵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 2集团军第 1方面军第 4军军长。

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马鸿逵父子又与冯部杨虎城争夺西北地盘。蒋介石为了酬劳马鸿逵，制止杨虎城向西北地区发展，想以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在征求马福祥意见时，马福祥以其子性情横暴，怕他地方官做不好，转而保举侄子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后来马鸿逵又活动想当河南省主席，以长期滞留中原，但没有如愿。

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达 17 年之久，独揽党、政、军大权，把宁夏视为他个人的私家财产，为维护其统治，他一直养着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宁夏的“土皇帝”。

马家军在西北横行无忌，作恶多端，手段残忍，多次血腥镇压边民。它在 30 年代彻底投靠蒋介石后，便积极与共产党为敌，与红军为敌。凶悍的马家骑兵曾使红军西路军饮恨荒漠。他们丧心病狂地攻打红军西路军，杀红军逾万，狂奸红军女战士，对红军西路军犯下了令人发指、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5 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路经青海南部时，马步芳设了三道防线拦截，配合蒋介石袭击红军；他指使部下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 1000 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戮。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围攻，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马步芳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 3267 人，其中活埋 2609 人，枪杀 575 人，用火烧死 56 人，其他如扒心、割舌 27 人。他的兄弟马步瀛还把 30 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对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除了枪杀、活埋外，由马步芳等对她们进行强奸，然后将她们分给部下做妻妾[illegible]环，使她们受尽百般凌辱。著名的红军将领、红 5 军军长董振堂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马鸿逵部参加过 1932 年 7 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936 年 10 月，红军第 1、2、4 方面军会师会宁，马鸿逵立即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

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全国人民笑逐颜开，而马鸿逵却嫌“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甚至痛哭流涕地说：“坏了坏了，这一下共产党成功了！” 1946 年 7 月，全面内战爆发，一向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马鸿逵，倾巢而出，侵犯三边，援救榆林，出兵陇东。

1947 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青马、宁马分别组成青海兵团和宁夏兵团，布防陇东地区，寻机袭击我西北野战军。1948 年 4、5月间，又进兵关中，配合胡宗南部在咸阳一带袭扰我军，企图进攻西安未逞。直至我大军开始进军西北时，才慑于我军威力而后撤。

马家军虽然长期与我军为敌，有过多次不大不小的战斗，但尚未遭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因而气焰一直十分嚣张。其所以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是与其自身特点及二马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马家军是一支以民族（回族为主）、宗教（伊斯兰教）、宗族、亲属、地域为纽带联结而成的队伍，有较强的凝聚力，利于笼络和统率；它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使其内部产生团结排外的力量；它还利用西北偏僻闭塞、文化落后，民智未开的状况，进行欺骗宣传，散布共产党及其军队“杀回灭教”、“共产共妻”、虐待俘虏等，使马家军士兵产生恐惧和仇视我军的思想；它更占有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

从数量上看，到人民解放军大举挺进西北的前夕，青、宁二马总计拥有 10 个军、33 个师（旅），兵力达 18 万之众，成为支撑蒋家王朝于西北一隅的一张王牌。

至于坐镇西北十数年之久的胡宗南部，则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虽然在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其兵力仍有 17 个军、41 个师，共 20 余万人。

胡宗南是黄埔系实力派的首领，自 1933 年 2月为防御红四方面军西进到天水，坐镇西北近 20年，被称为“西北王”。这位“西北王”原籍浙江镇海，1895 年生。中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小学教书，后因与某同仁争夺小学校长职务失败，不甘居于人下，负气出走，跑到上海，在小学同学开设的毛竹行赖以寄身。时为

1924 年，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胡宗南于失意之中，忽生投笔从戎之念，于是，便由章某赠其路费，到广州投考。不想因身材矮小，体格检查时被淘汰，幸遇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廖听他谈吐激昂而流畅，又有一定文化程度，便手谕准其参加考试，结果竟被录取了。毕业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

在国民党军中，谁都知道胡宗南是由第 1 师起家的。这个师于 1928 年编成，1929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前，在河南信阳扩编为三旅九团，胡宗南任第 1 旅旅长。1930 年夏，中原大战爆发，师长刘峙调升第一路总指挥，副师长徐庭瑶代理师长；徐负伤，胡代理师长。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认为第 1 师打得不错，遂把伤愈后的徐庭瑶调任第 4 师师长，胡宗南正式就任第 1 师师长。刘峙出身于保定军校，因而在他任期内第 1 师经两次扩编，任用了不少保定系及其他军校出身的军官。胡宗南接任后，为取宠于蒋介石，进行了彻底的人事调整。调整后的三旅九团主官全为黄埔第一二期毕业生；1933 年在甘肃天水成立的补充旅和骑兵团，旅团长也是清一色的黄埔生。

1935 年秋，胡宗南率第 1 师追剿长征北上的红军，由四川的松潘到达甘肃的甘谷一带。1936 年第 1 师扩编为第 1 军。胡宗南升任军长。年底西安事变发生，胡部于 1937 年开赴徐州、海州一带，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八一三“松沪抗战爆发，第 1 军于 9 月上旬开赴上海杨行、刘行一带投入战斗。由于该地战事异常激烈并不断扩大，部队的不断补充和增加，胡宗南由第 1 军军长升为第 17 军团长。

上海撤退后，部队开往陕西整补。1938 年武汉会战时，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结合部的信阳一带空虚，第一战区令胡部开往信阳，经激战后西撤，重返陕西，盘踞西安，名为扼守河防，拒河东日寇入陕，实际上是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执行蒋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

入陕后，第 17 军团所辖部队由上海抗战时的一个军加三个师扩大到四个军。在 1938 年冬的西安会议上，蒋介石拟升任胡宗南为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和白崇禧以胡在信阳作战不利为由，坚决反对而未果。西安会议不久，又举行武功会议，蒋介石又想把胡升为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李、白仍然反对。这一回蒋介石玩了个手法，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兼任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为副总司令。蒋鼎文深知蒋介石的用意，于是便作顺水人情，使胡以副总司令之名而掌总司令之实权。

1940 年，胡宗南被正式任命为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兼任了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这时，胡所指挥的部队扩大到五个军。1942 年 6 月，胡宗南在西安设立了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统辖四个集团军，一个河西警备司令部，以及归长官部直接指挥的三个军和几个独立师，共 15 个军，加上特种兵，总兵力约 50 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的副长官部改为西安绥靖公署，原属西北军冯玉祥部、陕军杨虎城部的四个军也归胡指挥，总共 19 个军。为执行“双十协定”，1946 年 3 月，国民党部分军队开始整编。胡部编并了几个军和不少师，总兵力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1948 年春，恢复了原来的编制。这时，胡部辖有裴昌会的第 5 兵团，李振的第 18 兵团，以后又组建了第 7 兵团，由北平和平解放时逃出的李文接替裴昌会，裴调任该兵团司令。另外，新建了第 57 军，重建了已被歼灭的第 3 军和第 67 军；同时，还指挥第 98 军和由甘肃省保安团队改编的第 119 军。总共 17 个军。

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因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彼此猜疑，勾心斗角，各自为谋。

二马貌合神离，互不服气，相互争斗由来已久。1949 年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所遗之职，成为马步芳和马鸿逵争夺的目标，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达到顶点。

二马与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也有很深的矛盾，内讧不已。虽然，为了避免遭至灭亡的共同命运，他们可以暂时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各怀鬼胎，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国民党军队之间的这种“窝里斗”，无疑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彭大将军进军西北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为此，国民党中央特于 1949 年 5月 18 日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进而千方百计拉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解放军西进大军。坐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发誓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狂妄之至。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如意算盘，还是马步芳再定乾坤的痴人说梦，都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新中国曙光初露，三千万西北人民正引颈翘望。

啊，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正如阵阵春雷，在大西北上空滚过。“挺进！挺进！向大西北挺进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啊，看到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王向着大西北驰奔而来，歌声嘹亮，铁流滚滚，征尘蔽日。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

与邪恶，新生与腐朽的殊死较量，即将在祖国的大西北——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黄土地上展开。

率领这支大军的就是横枪立马、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将军。

对于彭德怀，人们常常亲切地称他为“彭老总”，而毛泽东则以“彭大将军”相称。

有诗为证：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赠给彭德怀的六言诗。

这首诗，今天已被人们广泛传诵。它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赞赏和信赖。

自 1928 年 11 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 5 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 4 军会合起，彭德怀就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和生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他把毛泽东看做革命队伍中的大哥，进而看做自己的老师。

井冈山会师不久，国民党军就对井冈山发动了“会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红 4 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 4 军向赣南进发，让新任红 4 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红 5 军留守井冈山，担负

起保护伤病员、家属小孩的任务。对于这一决定，红 5 军内部反映强烈，大部分人认为与红 4 军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迅速北返，去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却坚定地指出：

留下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 4 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 5 军不承担这一任务，红 4 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就会受损失，甚至被敌人搞垮。

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毅然挑起了毛泽东交给的千斤重担。

在红 4 军撤离后的第三天，敌人以十几倍于红军的兵力围攻井冈山。彭德怀率红 5 军激战三天后，被迫突围，向赣南方向寻找红 4 军。1929 年 4 月，彭德怀率部经辗转苦战，在瑞金第二次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 4军会合。

毛泽东一见到彭德怀，便把中央“二月来信”给他看。信中提出，为了减小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彭德怀当即表示不同意来信中的意见，并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目前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这封信的原稿，一直保留在毛泽东的身边。

1930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的罗坊镇开会。毛泽东提出不同意中央要求红军攻打南昌、九江的意见，主张红军东渡赣江，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创根据地，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进攻之敌。

红 3 军团的指战员多为平江、浏阳人，不愿远离本地。因此，红 3 军团干部大多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 1 军团在赣江以东，红 3 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

彭德怀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红

3军团的干部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对彭德怀的这一次支持，毛泽东久久难以忘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3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立三路线，要求3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

彭德怀的这次“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3军团东渡赣江，驻在东固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结果酿成了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人送来毛泽东给其秘书古柏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成员。随信加附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认定这是敌人以伪造信件来达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毒计。他深信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是，他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1、3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

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即，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稿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不久，彭德怀又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 3 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到会讲话。这是 3 军团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聆听他的讲话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红 3 军团第 3 师政委的黄克诚认为，彭德怀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使毛泽东进一步“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又给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的中央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严厉批评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他说：

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的高度自觉， 1、3 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 1927 年开创到现在，8 年啦，1、3 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 6 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他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红 1 军团军团长林彪基于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

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近一两个月来，部队走路太多，尽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是否换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由彭德怀负责。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后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林彪的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也指责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大局为重，当时在红3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有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重提此事，以说明彭德怀在历史上长期和他七分不合作。这时，林彪当场声明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德怀并不知道。历史真相方得到澄清。

在此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彭德怀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还秘密抽调1个团的兵力隐蔽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以防突然事变。当毛泽东断然决定率1、3军团等部继续北进后，彭德怀一直与毛泽东同行。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即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宣布将1、3军团及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初到陕北，彭德怀即率部与马家军交手。对于新的作战对手，彭德怀分析说：

过去我们一直只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步兵），现在我们要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骑兵）。当前的敌人有“三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的骑兵，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我告诉同志们，骑兵并不可怕，打起仗来，马的目标大，容易瞄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时，下了马鞍子，是最好袭击的，特别是夜间。我们要发挥英勇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消灭敌人的骑兵。

全国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与朱德总司令一起，率领八路军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7年12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话，王明也讲了话。彭德怀认为他们讲话的共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以国际口吻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觉得这同毛泽东的抗日论点有很大原则分歧，认为这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以他发言要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回到部队后，他按照中央书记处的传达大纲进行了传达，但他又加了三条原则：一是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后来国民党派了高级联络参谋去八路军总部。对此，彭德怀牢牢掌握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教育部队：红军虽然改编了，但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再一次态度鲜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